

主題：偶然成為台灣人——他／她們的 1949

講者：趙慶華

時間：2019 年 6 月 11 日（二）14:00-16:30

地點：成功大學博物館大會議室

主辦單位：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主辦單位：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今天來到我們人文沙龍第三場。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台文館的副研究員趙慶華老師，來為我們演講這個主題：成為台灣人。為什麼我們今天要談這個議題，因為慶華老師我知道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個芋仔蕃薯。因為他的成長經歷，他在研究所碩博班期間他都深入投入這個議題的研究，甚至也參與很多外面組織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他之前參與過蒲公英寫作班。這寫作班，慶華老師和一群外省女性們共同完成了他們生命史的書寫跟創作還有紀錄，這個後來也出版成書《混搭》，我們在臉書上面也有介紹這本書，也歡迎大家可以上網搜尋這本書。他裡頭也記錄了很多，從他們生活細節、記憶，甚至是飲食，對味道的記憶，從各方面記錄他們的生命成長史，歡迎大家可以搜尋關注一下這本書。慶華她自己也完成了兩部很有份量的研究，但他本人很低調，都不願意張揚或出版，他的文筆非常好，讀他的論文常有閱讀生命史的感覺。

我們今天為什麼要談所謂外省人這個議題呢？老實說如果是十年前的話，我自己也許還記憶猶新。我們可能會覺得這個話題蠻夯的，在書局或文創空間，甚至在學術領域裡，會覺得他正熱門或大家不斷提起眷村記憶，或所謂外省人的生命經驗。這些東西在十年前被大量挖掘甚至商品化，可是我們也在想，十年後的現在改變了多少呢？在這裡共同生活的我們就更了解彼此了嗎？還是其實不了解的部分依然陌生呢？就是我們覺得，譬如說現在我們都很重視的台灣公民政治，這當中的裂痕真的已經修復了嗎？經過這麼多年。也許這幾天大家也很關心香港的消息，我想這也是我們要很珍惜台灣的公民政治，那台灣的公民政治要如何走到一個更完善的目標，我覺得他還是有賴於我們彼此的了解。大家更了解彼此，以及我們願意共同生活在這裡對不對？我們也希望這個議題可以持續討論下去，現在就以掌聲歡迎慶華老師來為我們演講。

趙慶華：各位朋友大家午安，因為今天早上下大雨，想說今天人一定很少。謝謝剛剛倍榕的介紹，我自己也是成大台文所畢業，所以回來講這個題目真的感覺很不一樣。我自己在論文發表以外，之前還沒有機會去談這樣一個議題，所以我們後來在討論的時候，倍榕覺得這個算是我長期在關注的主題，也跟人文中心有某些理念相合，我們就決定排一下。

當然非常關鍵的原因在於今年是 2019 年，2019 年不知道對大家有沒有什麼特別意義，或我們往前回溯 1999、1989，大家大概知道六四天安門事件三十週年，1979、1969、1959，到 1949 年。這個就是我們通稱，所謂外省人，對外省族群來說，從 1949 到 2019 是一個非常有意義或有紀念性的時間吧。相較於十年前的 2009 年，在所謂「遷台一家子」的這個年份，那一年出了三本重量級的文學作品，在 focus 外省族群遷台的這個議題噢。分別是齊邦媛教授的《巨流河》、龍應台的《大江大海》，還有王鼎鈞先生他終於把他人生的回憶錄第四部《文學江湖》寫出來的。那一年這三本書幾乎引起了大家轟動，更不要說《巨流河》，還有包括《大江大海》，雖然兩本書得到的評價不太一樣，或者是說有一些爭議的地方，但總之他在社會上引發非常大的波濤，還引發後續，甚至齊邦媛還有《巨流河》後續的出版……。

那到今年的話，至少就我自己的觀察，到目前為止，這個議題沒有太多人去談。我假設今天在這裡的朋友都是對這個議題有一點興趣，或想了解的。那不管我們了解的面相一不一樣，

或者我可以提供分享的主題一不一樣，那人員不是很多，我希望可以用稍微輕鬆一點的方式讓大家，我們用比較多的互動，來進行一些意見的交流跟討論。

我想先從幾個問題開始，在座也有一些比較年輕的朋友，我們稍微講一下，不管是大家現在這個年紀，假設台灣有一天發生某個大型的人禍，天災大概逃不走，人禍大概可以準備，或有錢可以跑路。假設我們有一天不得不離開我們生長的這塊土地，你被迫一定要走，有想過嗎？大家現在隨便想一下，會選擇去哪，你可以選擇要去哪，但是你一定要離開。（現場觀眾回答）（日本）。（澳洲）。（美國）。謝老師？（蘭嶼）。（在海上漂流）。同學？（澳洲）。（日本）。好，大家都已經跑走了，大家會想再回來，會吧一定會想再回來。所以在許可的情況下，你一定會選擇回來。那你希望多久以內可以回來。（三不五時）。我說你可以在不能回來的情境下，能忍受多久？（兩三年）。（十年），哇好 long stay。（要看那裡的食物），可是有時候也沒辦法選，就你還不能回來，要看食物。（三天）。三天還在上海。（越快越好）。好，對差不多，從兩三天到十年，這是一個 range。那我們再進一步假設，你的期待是沒辦法成真的，你再也回不去了，你覺得你可以經過多久，覺得你不再是台灣人？永遠不會。你會覺得永遠都是。好我們這題就討論到這裡。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是讓大家去想想，我今天談的會比較聚焦在外省第一代的生命經驗。所以就是說一直到今天，社會當中還是會有對外省第一代的長輩有很多質疑，或認為他們不認同台灣，不願意當台灣人。我想這個問題也許讓大家感同身受一下，不管多久，你們都永遠覺得自己是台灣人，當然這情境沒辦法完全類比，但某種程度上有點相似。他們當時離開的時候，是被迫要做這樣的選擇，當然他們可以選擇留下，當時來說離開是比較好的，但那個前提是他們覺得永遠不能再回去。

那接下來還有另一個系列的問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聽過外省這個稱呼，應該沒有人沒聽過的吧。同學你很年輕有聽過嗎？我覺得現在一般大學生已經對這個沒什麼感覺。接下來我們問一下，大家身邊有沒有這樣的親戚朋友，或在場有沒有本身就是第一代第二代？好，四位，包括我。那在所謂公眾領域裡面，檯面上的，不管政治社會文化經濟，各領域，大家知道有哪些人是外省人，可以講出多少名字？（郝柏村）（朱天心）還有嗎？（蘇偉貞），那社會公共領域上還有嗎？王偉忠（？）你講一個。（現在……你說國民黨的），對這樣比較快，很多國民黨的那個。那民進黨裡面有沒有外省人？有哦（但是比較少）王定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欸（段宜康），還有梁什麼，梁文傑，其實推到更早一點，鄭南榕也算，他是外省第二代，然後創黨的是誰，張俊宏，其實也很多，更早的黨外的人士，傅正也是，其實參與了民進黨的創黨。所以政治上，這是某一種象徵啦。

接下來我們來談一談，大家對外省的印象是什麼，不管是你自己就是，或是你身邊一些認識的朋友、長輩、親戚，對外省人印象是什麼？或者是講到外省人大家會想到什麼？（……字正腔圓）是同學還是朋友？（一個爺爺）（鄉音很重，不會講台語）（會強調自己的祖籍）（麵食）（我想說第一個感覺是我的外省同學都不用掃墓）（忠黨愛國）（榮民伯伯）（鄉音很重）（吃米干）你們家吃的，哦～眷村裡面的（我想到眷村還有國民黨）（我想到眷村）（陽春麵）。大家有幾點不太一致，但也有某種一致性，就是政黨傾向、吃的，然後語言，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們今天在講這個問題，我在談或思考的，無非就是這些，就是所謂外省人到底是誰，他們為什麼來到台灣？怎樣來到台灣？最後一個是最重要的，在經過這麼長的時間後，來到台灣以後，他們怎麼樣了，台灣因為他們有了哪些變化，他們自己有怎麼樣為台灣改變，或者無法改變。

這個是張茂桂老師，我們等等會講到一個組織叫外台會，他們後來在 2004 年之後出版一系列外省人學術的叢書，這也關注到外台會他們成立的宗旨。他在這個叢書的序寫了這個題目：你以為懂，其實也不一定懂很多的外省人。就是我覺得，大家一直以來都在社會上，我們講到外省人的時候，大家腦中會浮現某些記憶的形象或名詞。但很有趣，這麼久以來，我們對外省人的想像跟印象都沒有改變，或者都不太容易改變。我們真的很懂嗎？好像其實也不一定懂很多。張老師這篇文章就提到：「晚近台灣所充斥有關多元文化、族群國族主義的論述中，「外省人」三個字（有時有、有時沒有加括弧），經常以一種不確定或有疑問的類屬方式出現。我們應該如何適當地理解「外省人」？」過去，我們會追問外省人是不是一個族群？這個就西方社會學對於族群的定義來說，他好像不是那麼地標準。但是在台灣的社會脈絡歷史發展裡面，他又很自然被視為一個族群，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如果不是，他們有沒有出現類似族群的集體意識？就嚴格的社會學定義來說，他可能不算是族群，但他們卻出現了類似的族群集體意識，或我們想像的外省人就是統治階級嗎，還是一定就黨國權貴？還是自認高級嗎？這是前幾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有個叫范蘭欽的，他本名叫郭冠英，他是之前駐多倫多的一個新聞局的人員，他後來常常用「范蘭欽」去寫很多文章，可是在這個裡面他就極盡所能地去污衊台灣本土的人，比如說：台巴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他自稱是高級外省人，其實外省人都不想自稱高級哦，他就自己把自己提高高級外省人，前幾年其實引發蠻大的風波。

除了這些高級外省人或統治階級，是不是有許多被遺忘的底層階級的外省人？或者我們也可以進一步去問，「外省人」為什麼要自稱為「外省人」？或者是被稱，難道是自外於台灣？他們是不是「愛台灣」？「真的愛台灣」嗎？社會上很多人總是很想問外省人的這些問題。那接下來我會先從來了台灣的外省人是哪些人，我有選了幾篇作家，或者也不是作家，或一般很底層的階級的媽媽們，他們寫的，他們會寫他們怎樣來到台灣的這個過程。

首先這位是桑品載，他說他來台灣的時候才十一歲，他來的時候也是有個很曲折的故事，他們在中國家裡的時候，來了一群國軍住在那裡。其中有一個連長看上了桑品載的姊姊，後來他的軍隊要開打了，這個連長想要把他姊姊帶走，就是喜歡他想把他帶走。那這個媽媽也沒有反對，反正時局很亂，跟著軍隊有個照應。後來桑品載覺得他媽媽非常神奇，那時候爸爸都不在家，等於他媽媽決定了他的一生，好你可以帶姊姊走，但你要把弟弟一起帶著走。他們就走了，隨著軍隊準備要來到台灣。結果上船前，軍隊突然說女人不能上船，所以姊姊不能上船，姊姊就把一些銀大頭，家裡的財產通通給了桑品載，他就說不管，他並不是女人，那你們把弟弟帶走。就是這樣一個很不同的轉折，桑品載覺得媽媽的決定了他的一生，變成他來到台灣，可是也永遠離開家鄉。這就是一開始的時候，這一段是他準備要跟姊姊走了，媽媽就說，去台灣以後要聽姊姊的話，要聽蕭連長的話，可以回來的時候就回來，媽媽當然也很難過。桑品載底下還有兩個妹妹，妹妹本來也說要跟著哥哥走，後來桑品載就說哥哥是去台灣那麼遠你怎麼能去，要過端午節了，我會從台灣買一大串粽子回來給你吃。所以他就在想說，還有一個月就要過端午節了，我也的確相信去台灣只要一個月，就可以回來了，這是他〈岸與岸〉的這篇文章。

那當然除了外省人之外，也有很多台灣的作家會寫他們所寫到的外省老兵。其中最特別的就是這個履疆，他的名字叫做蘇進強，他以前是台聯黨的，主席還什麼。其實是一個非常本土色彩強的作家，但是他這篇《老楊和他的女人》，寫得非常非常感人。就是老楊就是我們印象中的老兵，平常話很少，他就是去到部落裡面，跟一個一直被欺負看起來就是原住民的女孩子，之前在外面的世界，後來回到部落，都一直被男生欺負。後來老楊就跟那女生在一起，照顧他。履疆筆下的老楊就是這樣子，他殺過很多敵人，本來是莊稼漢，但被送出去參

加悲慘的戰役，殺死高大的美軍，之前就參與過海戰，又被俘虜。想回家，但又不願意投入那些工人的運動裡，所以後來來到陌生的島，再度穿上軍衣，在一次戰役中被砲彈擊傷肩與腿，這是履彊筆下的老楊這個老兵。

這個張曾澤是一個電影的導演，他自己寫的就是我參與青島大車隊，他其實小時候就從軍，是蠻小的娃娃兵，軍隊要離開了，他就趕快跑回家說我們要走了。所以他就寫下這幕：「我看父親一向是很嚴肅的人，一直沒有說話，然後只注意到父親的嘴唇都起泡泡了，母親頻頻拭淚，弟弟則是愣愣地看著我，就這樣，我與家人沒說一句話就分手了。」這是一個大家可以想像，就是要分別了，可是什麼話都講不出來，非常突然，很突兀的場面。「這一離開就是四十年，也是我見到父親的最後一面。」這是他寫從青島撤退。

再來就是某有名的詩人叫做管管，管管也是在青島，他在講說他是被抓去的。他們家本來是那種農村的農家子弟，後來有一天有人喊說「抓兵來了」，我媽叫我趕快跑，他給我做好一個餅子，就是那種大餅，然後我包在一個洗臉毛巾，束在腰裡就跑了，那天跑出去二十多個人。一群人跑出去要躲這個抓兵，可是後來還是沒有躲成功，裡面有四個人還是被抓了。

那接下來這三篇就是剛才倍榕有講到，就是我們在這個 2004 年之後跟這個外台會有個計畫就是說，主要是我們過去在談外省人的時候其實太多焦點或者關注對象都是男性，外省男性，軍人啊老兵、黨國權貴、菁英子弟，基本上都是男性。其實我們腦海裡，除了眷村媽媽以外，想不太出來外省的女性是什麼樣子，或者是他們的生命經驗有哪些跟男性不一樣的地方。後來他們連續辦了有大概十屆這種，所謂蒲公英寫作班，就是在全台灣各個縣市社區大學開這樣的課程，就是號召這些有眷村生活經驗的媽媽，或外省籍的媽媽來寫作，透過一些引導，讓他們寫下他們的生命故事。這個系列的作品就集結成書，除了我編的那本以外，前面也出了兩本，所以一共有三本書。

這幾段是在這個寫作班的學員，他們寫他們自己或他們的父母，不一定是他們自己，因為他們有些是四五十歲可能第二代，可能是寫父母親的經驗。這是一個碧珍麗的同學，我畢打錯了，畢業的畢，他就寫說他的父親十四歲的時候，連生日是哪天都搞不清楚就離開了故鄉，原本以為過個三年五載戰亂停歇就回山東老家，誰知越走離家越遠，一直到了台灣就再也回不去了。那省曾璉珠〈遷徙地圖〉是之前上過我的課的一個媽媽，他這篇講到，他們家是住在水交社，他爸爸是空軍。所以他們是從虎尾的空軍眷村搬到水交社，這個是他在講剛要過來的過程。他就說：「三十八年的秋天，爸爸宣布說，過兩個月我們要搬到台灣住，我們要搬到台灣住，因為共產黨就要打來了。台灣是什麼地方呢？他究竟在哪裡？滿心頭都是問號。」這邊比較有趣，「過了幾天，聽大人聊起，聽說台灣的豬肉跟雞蛋都不能吃，」我在打這個的時候想說，中國的豬肉才不能吃咧。「聲音充滿了惶恐不安。」那時候他爸爸是空軍，所以他們就搭乘當時所謂的老母機，當時大概很炫，因為大家都要去擠那個輪船，他們是八個一起來，然後從四川重慶直飛台灣。他說他們一下飛機就到虎尾，後來才到了台南的水交社。

這個孟訥也是個老太太，他寫的是她先生，他自己跟她先生，都是三十八年的時候，我們剛組成家庭……在大陸大撤退的過程中，軍隊和一時無法安頓的平民，一時塞滿了台北街頭，一副兵荒馬亂的景象。我常深夜不寐，這個太太就是很悲傷哦，回不去了，可是流著廣東人冒險汨濫的血，這個是寫他先生，就是說卻淡淡地安慰我說，回不去我們就在這裡做遷台一世祖。後來這個奶奶已經過世了，反正就已經到第三代了。

那接下來有幾個是大家比較熟，這個是齊邦媛老師他寫的《巨流河》，前面的幾則，比如說男性被抓來當兵，在軍隊；前面的媽媽們，跟著父母親，或跟著先生來；可是也有些女性，是自己未婚的、單身的，他們自己選擇來到台灣，這很有趣。齊邦媛老師不是 1949 年，他早在 1947 年就來了，如果有看過《巨流河》的人會知道，戰爭對他的人生帶來很多情感上跟生命經驗的打擊。這個是寫他在戰後 1947 年，他們家先回到南京，後來回到了北京。他其實，當時大學剛畢業不久，他就在猶豫，到底要去哪，要去上海工作還是要去哪。他說他們家就來了一位客人，叫做馬廷英，馬廷英是一個 1947 年來台灣大學的地質學家，他有個兒子大家大概知道，叫做亮軒，馬國光。他叫馬廷英馬伯伯，他說這個馬伯伯看到我在這個十里洋場的邊緣晃悠徬徨，就說他此來為台灣大學找學院的教授，那聽說外文系也在找助教，什麼都沒有，現在兩個日本教授遣送回國，就去做助教吧。

那因為齊邦媛當時的心情是非常沮喪的，他仰慕的一個哥哥軍人過世了，當時他也目睹了一些國共內戰，在大學裡看到同學們，國民黨跟共產黨鬥爭得很厲害，學生之間，透過各種學運什麼的。他就覺得人生超空虛，他就說，在我心目中，孤身一人更往南走有自我流放之意，可以打破在南北二城間後腓征田的僵局。當時整個中國都在非左必右的政治游滿中，他就覺得連不表態，連想把頭埋進去自由的空間都沒有。每一個人說，你去看看吧，去見識新的天地也然後呢，看看就回來，大家都留給我一個寬廣的退路。他當時是 1925 年嘛，二十二歲的女孩子就被允許或鼓勵去到一個新的天地，其實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事情。他就說 1947 年，他隨著馬叔叔，就是馬廷英渡海到台灣，想望著一片未知的新天地。爸爸給我買的是雙程票，但我竟將埋骨台灣。因為後來她爸爸媽媽都來到台灣，就是家裡再也沒有回去。

這個是軍眷，這個蕭曼青，有一本書叫做《像我這樣的母親》。那蕭曼青他就是一個作為軍人的眷屬，所以在這個書裡他有非常詳細地說，他跟著先生他們軍隊退退退，從哪裡退退退退到廈門，為上工有利，眷屬要送到台灣，這樣我們才不會有後顧之憂。相對於齊邦媛是自主性的選擇，對於蕭曼青來說是非常驚惶害怕，不願意遠離家鄉，但終究沒有辦法。他就寫道，他搭這個船，多麼擠，非常糟糕的情況，擠成沙丁魚一樣，汗臭味尿騷味等等。然後好不容易，跨過好不容易找到廁所……反正他形容得非常慘。他們家到了台灣之後也很慘，因為先生就是在軍隊遠遠的，無法及時照應，然後他們在那個基隆的碼頭，度過很多天，搭那個非常破爛簡陋的房舍住下來。他這筆下的恩兒，其實就是後來台灣大學的教授高天恩，就是，反正他就是非常成器地養大了孩子，可以看到這樣的，好。

這個是另外一個作家，羅蘭，就是一個早期的散文家，也是一個廣播人。羅蘭跟這個齊邦媛有一點像，他也是自主性地選擇來到台灣，在 1948 年。當時也是一樣，戰爭剝奪了她所有夢想，包括他的學業，然後父親的工廠，家裡的事業整個都受到很嚴重的打擊。所以他當時也是非常地黑暗，他就有一個模糊的決定，奔向海外的島。對這兩個女性來講，海外的島、遠方的島，是一個可以探頭呼吸的自由的空間。當然他也有講，離開生長的地方，等於是放棄一個熟悉的自己，而那種放棄對我來說就是擺脫，就是不用再……。他來到台灣，也是有個有趣神奇的轉折，就是他遇到一個他的小學同學，剛好在船務局工作。大家都買不到票的時候，他同學就輕輕鬆鬆幫她買到票，所以他說，輕而易舉懵懵懂懂就來到台灣。

最後我舉的例子是，成大的資深中文系教授，蘇雪林老師。蘇雪林老師又非常不一樣哦，大家如果知道他在來台灣之前的一些經歷，她在來台灣之前，他就已經是一個學術界蠻有名的人，當時的知識女性。像齊邦媛是剛大學畢業而已，但蘇雪林那時候已經是一個在武漢大學教書的老師了，所以後來他 1947 至 1949 這幾年，他先去了巴黎，他住在巴黎。在巴黎他就會想到，他在回憶錄有寫到，他自己的生活在很困難，很困難怎麼辦？他就去跟這個武大的教

授王世杰，顯然就是黨國裡面比較權力核心的大佬，去跟他說可不可以給我零錢。武大的教授說他已經問教育部長了，教育部長說呢，國民政府剛遷台，各部門都鬧窮，哪能有錢救濟流亡在海外的教授，而且海外教授不只蘇雪林一個，如果大家都來，哪能應付。那怎麼辦呢？他就去找更高層，就是蔣介石，校長就去找了蔣介石說，蘇雪林是國立的武漢大學的教授，反共反魯迅非常激烈，今流亡海外生活潦倒，理應救助，所以這個就找對人了。這是蘇雪林寫的不是我寫的，他寫蔣公說，我正好有一筆特別款項，現即就中撥美金五百元，由你匯給蘇教授，就是有關心沒關心。

他後來就在巴黎靠這筆錢過了一陣子，他發現說她姊姊跟她姊姊的兒子來到台灣，他姊姊有心臟病，所以他很希望可以快點來台灣。所以他又寫信告訴這個王校長，說請他為我保有足以糊口的大專教席。然後這個校長就幫他處理了，所以他回來就先在台灣師大教書，後來才來了成大。然後他來到台灣之後怎麼樣，很多人來台灣很不適應，在這種異鄉異地，不熟悉也不適應。可是蘇雪林就不一樣，他從巴黎到香港，再到台北，他就說在 1952 年，文藝界許多人聞我至都來拜訪，非常士誠相待。他其實當時在中國的時候，跟魯迅有很激烈的筆戰，就反魯，反左派、反共。所以他就說，當時所謂文藝界，是指左派文藝界哦，視我如異端如化外，所以當時他是非常地不得志，很被打壓的。但是他寫文章，只能投到國民黨辦的，沒有生氣的刊物。大型有價值的刊物，從來無我問津的餘地，這是指在中國的時候。現在可好了，我到了台灣，倒像絕處逢生，獲得一個新生命，其樂趣為以往十餘年未有，深以回台灣為得計。你會看到說，外省人真的很不一樣，很多種，不同性別、階級，不同世代，所以他們經驗，會讓我們看到說，他們來台灣的經驗跟心情跟處境還有背景，怎麼選擇決定，都完全不同，是非常不一樣的。

這些我們先把他放一邊。

接下來我要談的是，國民政府來了之後。我們今天說 1949，基本上是指國民政府來到，所謂在國共內戰失敗，退居台灣的一個時間點。在這個時間裡面，在 1945 年之後，基本上黨國教育，就是我們說中國國族意識形態的關注，就已經開始了。當時，比方說，在國民黨的策劃下，他們編了《民眾國語讀本》，裡面會有中國歌呀、國土歌呀，讓台灣人去認識中國。1945 年開始，就是戰爭結束之後，首先定行的就這些，包括推行國語文，最重要的一件事，伴隨著國語，接下來就是一系列的日文讀書雜誌的取締，廢除報紙的日文欄，等等，禁用日本姓名，就是日治時期留下來的這些都一併除掉。其中有個重要的主旨核心就是，將台灣人排除在統治決策族決定之外。因為大家都知道，當時台灣的教育水準很高，有很多知識份子，可是國民黨絕對不願意這些台灣人加入或者是干涉他們的統治，或者是維持他們統治正統的核心地位。所以他們就透過語言這個東西，他們就說，本省雖有良好的技術跟苦戰的精神，但許多人用日文為建設中國的台灣，首先要先請台胞學習國文。所以就是說，你先學好國文再來吧，你語言都不通，再好的學識有什麼用。

到後來二二八事件，到 1949 年這個所謂的國民黨流亡政府，他來到台灣建立所謂的侵佔的政權，就是用支配原始居民的新移民所形成的政權。照理說，每個地方的政權應該由當地的居民來統整，可是會有這個侵佔者政權就是，新來到這裡的新移民，去支配了原始的居民。這個系統的目的當然是保有侵佔者的政治優勢的地位，那這些大概其實，大家也許不太陌生，所以我們簡單帶一下。總之最重要的就是以黨治國，那國民黨的體系有黨政軍特，國民黨的黨，政黨的體系，政治統治者，軍事，特就是特務，最嚴厲的特務系統機關。我們說所謂後來的白色恐怖，就是從這個延續下來。

學校教育裡面就是透過，看到「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要」，黨化教育、軍政課程，民族精神的教育。然後就是有軍訓課嘛，對不對。學校大概，你們現在沒有了吧？高中不用上軍訓課？那就是（還有）還是有。我們以前上軍訓課，所謂三民主義。這個東西就是透過這些系統，讓教官進入校園，除了糾察學生，用各種方式去統管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說服學生入黨。這個謝老師應該沒有吧？比較年輕，沒有這個經驗。大概五年級以上的世代，都有這樣的經驗，就是要入黨，男生當兵或以後出國留學，都是重要關鍵。總之最重要的就是，打造中國為最終認同的台灣。這個理念呢，國語運動我覺得是一個最核心的起點，也是終點，等一下我們會講到。透過就是統治者能夠流利使用的北京話，訂定為國語，標準的官方語言，透過教育體系、傳播媒體、行政命令，在各種不同體系都要使用，都不斷宣傳強化。

在教育體系裡面，剛開始的時候，這個學校教育裡面，基本上還可以允許以台語，因為語言母語，他是使用華語的讀本，可能還容許老師用台語教學。後來就是以華文為讀本，強調要用華語，台語僭建地被打壓，不可以使用。更後來就是用華文跟華語，完全地壓抑了不要說日文了，更壓抑了所謂母語的使用，在 1956 年開始全面地說國語運動。所以就有這個，我要說國語我不說方言。或是這個，用羅馬字拚的發言，有礙推行國語，通知教會禁止，比方說聖經、各種經典，各種讀本，過去用這種所謂白話羅馬字，讓民眾可以好念，好讀，這樣就不可以了，全部都要用華文跟華語，說跟聽讀寫都要用這樣的語言。

這樣的結果造成什麼的東西？就是所謂高文化的產生，所謂的國文國語這樣的東西，伴隨著後面的意識形態各種文化產品，形成一種高文化，也就是主導文化。高文化就是他使用於正式的場合，比方說國會，這種政治的殿堂，學校新聞媒體，標準的國語。通過各種意識形態的灌輸，會讓大家覺得，這種高文化的語言是比較高雅、具有邏輯的高階語言，階級比較高，比較高級。母語只能在非正式場合、家庭聚會啊，或者他只能散落在民俗文學的方言，難登大雅之堂，粗俗無文，是低階的。基本上國民黨長時間的語言政策就是在做這件事情，他讓大家覺得自己的母語是很糟糕很粗俗的很低級的，要講國語，而且還要講標準國語。那就是說對國民黨來說，現代國家要生產跟維護高文化，是為了標準，透過制式教育以及標準化的系統，去生產均質的國民，大家都好像很高級。這個高文化就是國家認可的加諸於一個地方的均質化語言。所以他不止語言而已，他是伴隨著文化來的還有知識的體系、歷史、文學。所以過去台灣被說沒有文學，中國的才是正典，我們讀歷史沒有什麼台灣史概念，都是中國史，延伸下去就是藝術、戲劇、繪畫，就是背後這樣一套文化產生系統的成果，都一樣。所以以前我們說水墨畫就是被稱為國畫，還有國樂這種東西就好像這種位階比較高。到後來才有李筱峰老師說，不應該說他們是國畫或是國樂，就是這個管弦樂或水墨畫類似這樣。

好，這樣一套系統，當大家都被建構，黨內內建了這套文化系統之後。一方面就是，好像所有人都可以共同分享這有意義的世界，好像我們都知道、理解了，或某些時候的標準、價值判斷、世界觀、審美觀。但很重要的事情是，這也會影響對自我的評價。這個自我就會產生，比方說對外省族群跟本省族群來說就會不一樣，對外省來說就會怎麼樣？他就會覺得我本來就擁有這個文化系統，我的語言就是比較高級的，然後本省人要學這些東西，你們要學這些東西。你們的母語或過去學的日語，就是比較奴化、低階的，階級低等的。這個東西就造成了等級化的族群結構，外省人過去可能沒有覺得自己很高級，可是我覺得那種優越感確實是有的。因為透過這樣的一套體系，對於外省族群來說，這套文化符碼對他來說是比較嫻熟，比較好使用的，那這個東西就會影響到他們的教育，或在教育中，對他們來說，知識的吸收比較容易，因為語言比較嫻熟。所以一但教育的水平提高了，或者是說普遍來說，可能受到比較高等的教育，接下來就會影響到他們的社會地位。

所以確實 1980-98 年代，社會學家會去分析，從政治、經濟，特別是收入、社會地位去分析，確實他們得出來，外省人在過去是擁有比較高的社會地位的。較高的工作職位，也包括較好的待遇，特別是過去那個年代，在公部門、教育單位，在中央的體系裡面，基本上外省人比較多，透過這個教育跟語言的優勢，然後取得、進入這樣一個體系。也就是說，這個東西就造成國語具有穩固的市場價值，就是他是一個好的勞動市場。你如果去到一個，國語越流利，職位地位越高。比方說考公職，他可能語言有加分，比如說你要當廣播員、記者，這些都有助於讓你比較有利去取得這樣的位置。這個東西就變成我們說的文化資本，特別是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若要考公務人員，其實是有省籍背景、族群背景還有語言這樣的篩選背景，所以以北京話這個語言，他可以篩選軍公教人員。

剛有朋友講到他最有印象的就是朱天心，他最有名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他其實很就有講到，他就說，他小學六年級，在國民義務教育還沒有延長成九年之前，因為我們初中還要考試，好吃驚，他們，他自己啦，他們這種外省的小孩，班上的同學居然可以選擇不考試、不升學，儘管他們暗自頗為羨慕，這些本省同學不考試不升學，而回家幫家裡耕田、木工、水電工的師父，他們眼前除了繼續升學，竟然沒有它路可走。大家會覺得這種敘述很怪嗎？你們覺得哪裡有問題？你覺得這個敘述你有沒有覺得哪裡怪怪的。（觀眾發言，聲音模糊）這個，對，這個相對來說，對本省同學來說，升學是比較困難的，在當時教育環境條件底下，語言可能是本省同學升學的障礙，或者是比較困難的一件事。對他們來說，讀書是相對容易的事，特別是以這個國語為主要教學教育語言的時候。所以，這個東西你看起來好像順理成章，當然我們會知道說，他沒有看當時的社會結構跟背景。

所以這裡，我們剛好可以引用王甫昌老師的一個說法，就是優越的外省人，假設在這段裡，我們可以把朱天心定位成他沒有意識到自己處於優越的地位的狀態。不管是他故意沒看到，還是他真的沒有感覺，或他忽視、不覺得是這樣。但這確實是，優勢者通常不會認為，自己得到較好的報酬與自己的族群身份有關。我覺得這可以運用在性別啊、族群、階級都一樣，站在優位的那一方，通常不會覺得自己可以受到比較好的待遇，是因為自己的族群身份、性別身份或階級身份，而是怎麼樣，優勢族群會覺得自己的成跟優勢位置是個人的努力或基於自身優秀所造成的結果。這個白人也常這樣想，黑人就是笨就是懶惰，或漢人就覺得原住民就是不努力不聰明，可能覺得，我們是很努力才達到這個位置，但殊不知。你看他們很少認為是自己剝削了弱勢者，才能享受這些好處。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在講外省人是什麼既得利益者，是什麼加害者，還是戴上加害者面具的受害者，就是很多種說法。這個演講的訊息出來之後，就有朋友轉到台南在地的一個活動訊息的社團活動頁面。我就有看到我一個不認識的朋友，他覺得這個題目很刺眼，好像在同情外省人一樣。我覺得同不同情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可是我要講的就是說，這種關係，雖然我們就會覺得外省人也有很多種，也有像郝柏村這種黨國權貴，他們收了很多好處，可能本身也是加害者。但確實也有像朱天心這樣沒自覺得，他常覺得他爸就是一個窮軍人，就是一個寫作的人，然後他們家也住很破爛很久的房子。可是在社會結構上，其實我們會知道，他們沒主動做什麼，確實因為他們的族群身份，有享有一些，講既得利益好像有點難聽，但是就是說享受了某種優勢的地位，或是很順理成章，比較容易得到比較好的成果，大約是這樣子。

所以等級化的族群結構裡面，有一群人叫做永遠的外省人。那這個包括具有文化資本的文化人、作家，或是事實上當時 1949 來台也有很大一批，我們說的知識的文人，像臺靜農教授這樣的人，也有這種黨政界的菁英，也有文化界的。但是在這樣的一群人當中，也有統治階

層中的被統治者，就是我們說的老芋仔，榮民、老杯杯，他本來叫做榮譽國民，後來簡稱為榮民。這群人長什麼樣子？這個大概在作家孫瑋芒有提，這個形容我覺得描述很貼切。他說：也許你曾留意這些漢子：「巷子裡叫賣包子饅頭的、夜間開計程車的、大街上開麵館的、山嶺上經營果園的，各地各處，各鄉各市，一副副南腔北調，一張張古銅色的容顏。」這個大概是老兵在大家心目中的印象。

那基本上為什麼會有這群人就是，國民政府來台灣之後，有所謂 60 萬大軍，非常大的軍隊人口，對他們來說其實非常苦惱。所以他對這 60 萬所謂的抗日戰士，進行一種政治的恩庇，所以他透過退除役或退輔制度，大家可能有聽過行政院官兵退休委員會（編按：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就很長的一個名字，就退輔會，現在還在運作，對象就包括現在的軍人。在當時基本上是針對這些 60 萬的抗日戰士退役除役，退役除役之後要輔導，就安置他們，讓他們住在哪裡；若有傷殘，在哪裡就養；怎麼樣協助他們就業或是轉業。這樣的一個制度也不是平等的，並不是對 60 萬軍人都一樣，他其實也有一種階層性，形塑兩種截然不同的，一個是軍官，一個是士軍官。所以在孫瑋芒這篇文章裡，我們可以想像這種所謂的老芋仔是比較低階的是軍官。就是他們退下來以後，我又要講朱天心。朱天心的爸爸退下來以後，他被安排去了黎明出版社當編輯，也去教書。可是你看像這樣子低階的士兵，去賣饅頭、去開計程車，去做小吃開麵館。或者到山上，大家喜歡去山上，清淨啊很多台灣東部農場，就是他們去的地方。

所以你看高階軍官，就是去學校、公民營事業單位或甚至可以去政府機關，去了之後還有終身俸可以領，以前那個 18% 就是這些。低階士兵官怎麼樣？就是「三個月的薪俸及主副食代金約四、五百元」的退伍金，好一點的話就是蚊帳一頂、蓆子一條、衣服二件，就拿這些東西，然後怎麼樣，去參與國土開發工程，包括中橫、南橫，這些國土開發工程。或者是轉往民間自謀生活，或者是安置於東部農場。而有些作戰時變成傷殘疾的人士就去住榮民之家、療養院。

我再讓大家看一個。（放影片 1:05:00-1:10:08）1965 年就是有個導演叫陳耀圻，他就是拍了這個《劉必稼》，他當時就是在東部農場裡。非常巧合的是，我們剛才看影片的敘述是胡台麗，學者。在民間從事不固定、低技術性的工作，單身或晚婚，住在榮民之家或散居四處。他在 90 年，他又看到，因為他之前看過這個片子，所以他知道這個就是那個導演裡面的主角。所以後來他又繼續由《劉必稼》的主角拍了另一部片，叫做《石頭夢》。陳耀圻那部電影裡面比較不容易看到，但在《石頭夢》可以比較容易看到，他其實就很完整敘述，陳耀圻拍《劉必稼》是覺得他就是一個，他是一個很典型的中國莊稼漢的形象，一個很純樸的單純的一個漢族。但是胡台麗在《石頭夢》裡面比較完整敘述了《劉必稼》的一生，包括大家我不知道有沒聽懂，就是里長講那個老榮民，結婚很晚，他娶的太太其實就是一個寡婦。然後這個太太也有跟前面的先生生了小孩，但後來也都跟劉必稼很好，他們都叫他 O 叔就是像父子一樣。他們其實後來，為什麼要叫石頭夢，就是他們都在這個木瓜溪，他們去找石頭，因為木瓜溪有很多那種，像是玫瑰石，或是很棒的就可以賣很好的價格，後來他們就在做這件事情，胡台麗就把這件事記錄下來。但那部片子後來有一個引起大家爭議跟討論的地方就是，胡台麗拍紀錄片會有點這樣，就是導演會去主導。所以他後來問了這個劉必稼說，你覺得你現在是台灣人了嗎？類似這樣的問題，就是想要引導劉必稼講出來他認同台灣這件事情。大家知道，你很難揣測胡台麗為什麼要這樣做，但當時確實引起了大家比較多的討論。

所以我們回到這裡，透過劉必稼這個形象，其實會牽涉到這個國民黨政府在 1959 年對老兵，就是這些單身的軍人禁婚令，在此之前，他們是不能結婚的，他們一個人來台灣，他們沒辦法結婚。因為一方面覺得很快要回去了，再來就是有各種理由限制。那到了 1959 年，

大概覺得差不多了，就放寬了禁婚令的限制，問題是，這個時候，1959年。好，假設是1949年，二十幾歲的軍人，這時候已經三十多歲了，基本上這些單身軍人，第一個就是他們經濟能力通常不好，軍人就是薪水沒有很多。再來就是，缺乏人際網絡，他們在這裡就是單身一個人、沒有背後的家族網絡，再來就是年紀太大，總之就是他們在當時的婚姻市場上，是調價很差的人，所以只能選擇「不正常」的婚姻或性關係。所以胡台麗有講，他們可能只能娶寡婦或原住民的女性，或者是跟這種精神異常的女性結合，類似這樣，所以這個被稱為所謂邊際弱勢的結合，就是兩者都是弱勢，他們完全沒辦法透過婚姻去提升自己的經濟位階，或取得有利的條件，只能跟邊緣地位的女性建立親密關係。

這個東西我們在文學裡面最長拿出來講的例子就是，原住民作家裡面有一個叫利格拉樂·阿女烏，他自己的爸爸跟媽媽的結合就是這樣的故事。阿女烏的父親就是一個老兵哦，被退役然後什麼也沒有，很窮兩手空空地進入社會，沒有什麼錢，但做些小生意，賣豆腐或什麼的小攤。他在兩篇文章都寫下了這個故事，他就說「六零年代是許多外省老兵心碎的年代。在知道反攻大陸無望，老婆、孩子都在彼岸，不知道何時才能跨過這一條又深又險的黑水溝，探一探老家？更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客死他鄉，無依而終？於是都想找個女人」，因為對中國男性來說，傳宗接代是很重要的事情，他們真的也無子什麼，總之在離家很遠的地方，所以傳宗接代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怎麼辦呢？就是「大批的媒人、捐客會湧入原住民部落，作「婚姻買賣的生意」。」所以阿女烏的媽媽就是這樣。

怎麼進行呢？就是透過介紹人，他的爸爸和幾個老鄉，一同去到了母親的部落，聽說光是這一趟，他就花掉了一根金條。原來，介紹人集合了部落中適婚的女孩，辦了一場「山地少女選美大賽」，父親幾個人掛名「裁判」，名為選美，實為買妻，母親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父親以五根金條買了回去當老婆。他父親跟母親差了二十八歲，這年齡差非常大，所以爸爸也相對來說很早就過世。所以想像他這樣的婚姻，接下來會產生什麼樣的狀況？當然他們會花很多時間磨合，這種跨族群的婚姻，女性大概就會磨合融合進入男性的世界，眷村啊、飲食或生活習慣，可是接下來就是在眷村裡阿女烏的母親就跟朱天心他們家的眷村很不一樣。他的媽媽就是在眷村一天到晚被其他太太欺負的角色，因為他媽是所謂的山地人，你看當時的社會裡面，老兵是統治階層中的弱勢，原住民則是弱勢中的弱勢，更底層的這樣一個族群身份。所以他媽媽就會被眷村裡其他的媽媽推去水溝或被打，這些都是阿女烏年紀很大之後才知道，早期他媽媽也都沒有講，就會有這樣子的故事。

可是即使這樣，阿女烏的父親這樣一種離開軍隊之後完全沒有受到國家的照顧，或者非常詭譎或有趣的是，這些榮民以老蔣總統為中心延伸到對中華民國及國民黨有一種圖騰式的羈絆。國旗、國徽這個符碼，對他們來說就是永遠效忠的一個對象。他們會覺得自己是老總統的子弟兵，我確實有接觸過一些伯伯就是這樣，其實跟老總統非常非常遠啦，不是貼身侍衛或什麼，但他就會覺得他就是他的人這樣子，流露出一種近似宗教卻又愛恨交織的情感。他也知道他對他們不好，他沒有好好照顧他們，甚至沒有帶他們回去，這些事情。就是他對這個領袖永遠都是忠貞不二的。

他們是屬於這種就是說在族群的環節裡面，他們是外省族群裡面非常底層。但就國民黨政軍權力來說，他們又屬於周邊的環節，他們的思想、言行，基本上會與這個黨國政令或政策都一致。因為他們多數混得不好只能以勞力維生、蟄居社會底層，成為與優勢少數十分親近的弱勢少數，所以我們說他們是統治者中的被統治者。這個是我們會特別挑這個榮民，除了優勢的外省人，或這個榮民這樣子統治者中的被統治者之外呢，外省族群裡面當然還有很多其他類型，比方說不同的，我們知道有流亡學生群，可能大家知道有山東學生流亡事件在澎湖，七一三事件。然後也有女性的話，除了這個軍人的眷屬，也有女性的工作大隊，也是女

兵這樣一個類別。還有就是齊邦媛或蘇雪林這樣的知識女性，大概是這樣，非常多不同的。也有一群是在五零年代的白色恐怖當中就受難的這些外省人。或者是還有 1950 年代之後才來台灣的，大家知道的大陳島後來撤退來到台灣的。或者是韓戰爆發後，也有一群人不想回中國，就來到台灣，我們說是義胞，反共將士什麼的，其實是非常多的類型。基本上還是要強調說，外省人我們還是很難視為一個均值的群體。

好，外省人是這樣，那台灣社會怎麼去看待外省人？這個我會稍微講一下，就是台灣社會學界、文化學界、文學界，基本上有一個外省研究的系譜，有一個脈絡，我這邊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原則上，我把他分成，1980 年以前，因為台灣還沒有什麼研究族群的概念。比如說原住民族群他就用異族文化的角度去看待。真正比較有成熟的族群概念的研究是 1980 年代以後，那 1980 到 1994，1994 發生了一件事情等一下在講。1980-1994 這個階段是從「省級」的角度去談，外省人跟本省人的對立、抗爭去談，用省籍分類。基本上在當時，學者就已經提出來，省籍是不平等的。因為這時候台灣四大族群的概念也還沒完全成熟成立，所以就變成本省外省兩大區塊。這個時候，大家會看到的是，外省人作為一個壓迫者的形象，對應反抗者的本省人，學者會用這樣的角度去呈顯兩者的社會互動關係與群體差異。

那過去本省人可能心目中隱隱有些感受，我們待遇比較差，好像有些被歧視打壓，隱隱感覺。可是這時候開始因為有各種數據、統計數字的舉證，非常具體證明，去揭露出外省人的人口比例雖低，卻因其族群身分而佔據政治權力及社會文化的優勢地位，就是你們人少，但你們卻佔用比較優勢的社會位置，佔據比較好的資源，擁有比較強勢的社會政治或者文化資本等等。所以經過這樣的分析之後，大家知道，八零年代之後，台灣有很多所謂的社運，基本上是以公平正義為訴求的各個領域的反對運動。既然是以公平正義為訴求，當然就會覺得說，省籍不平等是不公平的，不符合公平正義原則的。所以這些反對運動能夠據此提出社會改革主張，覺得外省人不該怎麼樣，所以這時候就是外省人整體的趨勢，或大家的概念裡，會升值某一種印象：外省人就是統治集團、既得利益者、黨國體系附庸，然後當然不認同本土，也不愛台灣。

那到了 1994 年到 2004 年，大概這十年之間，發生了一件事情，這其中有一件很關鍵的事情就是 1994 年 9 月 25 日，新黨，就是趙少康那群人，他們在選縣市長、縣市議員的時候，他們在高雄勞工公園就被民進黨的人噏：「中國豬、滾回去！」這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政治人物就很會利用這種聲勢，這種事件去召喚外省族群的弱勢意識，讓他們開始覺得外省人被打壓、外省人被欺負被瞧不起。因為就人數上來說，他們是少數，當我們是少數的時候，就很容易被召喚出來說，我們少數被欺負了，多數人來霸凌我們等等。這個東西就是伴隨著九零年代的民主化改革、本土化運動，在這波運動裡面，本土化的政治人物、政治運動，漸漸地有能量跟空間去削弱黨國菁英的政治地位，去翻轉，本土化開始強調過去那些被壓抑、被醜化的台灣本土的文化的東西，開始被翻轉過來，強調大家要去認識台灣、認識自己的文化等等，就是翻轉了中國文化義理和中國國族意識的支配性，這當然也就挑戰外省人的優勢位置。

所以這時候的外省人怎麼樣？從本來不自覺的優勢，他本來不自覺他是優勢，因為優勢從來不會覺得自己是優勢，他變成有意識的弱勢，因為經過召喚，經過這種心理戰。然後這個時候，同時在台灣社會發生的就是中國意識跟台灣意識，中國結跟台灣結的發生，再來就是統獨之爭，大概就是這樣的背景底下。這時候的外省人自己開始出來，想要更團結、更強調自己，比如說他們會說他們又不是都是既得利益者，我們也有社會底層的人。當然這個時候本土化的運動，本土意識強烈，所以在強調外省人時，就會說他們不認同台灣。基本上就是我們談認同，除了利益、功利主義，既得利益的考量，還是有一部分是情感跟歸屬的問題。當

然外省人他認同中國是有好處的，他可以在這裡得到優勢的位置，可是我們還是不能否認，他確實還是有情感跟歸屬那樣子，就是那種讓大家永遠覺得自己是台灣人的一種情感。但這個時候，社會上比較不談這個東西，比較漠視這個部分，而是會很鐵板一塊地，把外省人等同於不認同或不愛台灣的既得利益者。

這就是後來導致有些外省第二代的作家，會在作品裡去諷刺這件事情，會這件事表達不滿。然後他們的做法就是外省第二代作家或學者，他們一方面知道中國國族意識形態站不住腳，他就解消中國民族主義，他不會再強調說自己認同中國民族主義，但在此同時他也詆毀台灣民族主義。他會同時說，民族主義是虛幻的東西，不管是中國還是台灣的，都不要信仰他。過去國民黨貫串我們中國國族主義，大家既然覺得這是很虛妄的，那麼你現在也不該去認同台灣民族主義，這是很多外省第二代的做法。他們就是早先的認同（中國），進入到這個階段，因為他們覺得他們不被台灣認同，所以就去爭取不認同台灣的自由，所以朱天心有另一篇文章叫做〈爭取不認同的自由〉，我在 2003-2004 年寫碩士論文的時候，他剛好發表了那篇文章，我覺得就是這樣的心路歷程。

可是外省第二代在這樣做的時候，外省第一代在幹嘛？他們並沒有因為說當時的台灣社會有個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就取消了自己中國人的身分符碼。他們沒有說我認同台灣，我愛台灣，他們沒有這樣做，為什麼？那我這個博士論文比較有點在處理這個問題，是情感嗎？還是利益考量？當然我覺得兩者都有，我覺得這其實是很複雜的問題。就是這些一生離散的外省人，在經歷了兩岸關係千頭萬緒的變化後，他們到底如何辨證「中國」做為一個國家符號與家園根柢的關係？對他們來說，確實在他們當中很多人，包括齊邦媛老師，他鄉中終有一天成為了故鄉，可是這個新故鄉的內涵、意義與價值是否完全等同於「故國」？等同於他們原來心目中的家園、中國？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探究的問題。

就到 2004 年，這時又發生了另一件事情，大家應該還記憶猶新，就是 319 槍擊案，那年選總統，總統大選發生喝 319 槍擊案，整個社會被撕裂到不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底下，成立了外省台灣人協會，這是一群所謂的外省第二代，就是大概長我一個備份的那些學者老師們，包括張茂桂、范雲啊，他們一起成立的。他們當時就說：有感於社會因為政治衝突而對立分化，更隱憂於外省人的不利處境，你按這還是某種弱勢群體意識在發酵，也許確實他們感受到的是這樣，就是好像當時外省人成為了一個污名的標籤，我覺得在這階段就是有外省身分的人的第一代、第二代，或是到第三代，大家都會被外省族群身份開始有很多疑惑，就覺得很悶這樣子吧。所以他們外省台灣人協會成立了，有成立蒲公英寫作班，希望更豐富多元地去挖掘外省人的生命經歷，特別是女性的。另外他們也出版外省人學術研究出版計畫叢書，這是一套五冊的書，每一冊有一個特定的議題：外省人的國家認同、流亡的離苦經驗、新家園的建立與想像、國家權力對親密關係的操控（婚姻、成家、生育）、經濟文化資源和階層流動，到目前為止只出版四本，最後一本還沒出來。

這個出版書基本上是從過去的碩博士論文裡面，邀請作者去把他們裡面的成果拿來寫為一般通俗文本，讓大家可以不用不同角度或淺近易懂的角度去進入外省人的世界，理解他們是什麼樣的人。所以我們就會在這個叢書看到，有眷村住民、外省第二代、流亡學生、參與黨外運動的菁英、還有被抓伏來台的老兵、甚至還有跨族群通婚的眷村婦女。總之大家就是希望顛覆將外省人視為優勢族群的固定形象，去勾勒外省族群的部分實像。大部分是指部分，因為太多了，我們怎麼聚焦跟挖掘，也只能說是勾勒部分的外省人形象。這是外台會他們成立的宗旨說明。

好，那最後。就是我們今天說偶然成為台灣人，但對他們來說偶然沒辦法就成為必然，那到底怎樣成為台灣人？對外省人來說，我們前面看到國家、黨政、統治者在統治者怎麼樣由上而下，透過一種巨觀政治統御力量去改造或強化在台灣的人的中國人認同，就包括外省人跟本省人。但這個巨觀政治統御力量是有縫隙的，所以這些流亡者躋身期間，就是在這個縫隙去接觸、體驗真實的台灣。我覺得這個就是他們可以認同台灣，中有一天要跟自己說是台灣人的時候的一個路徑，就是透過這些縫隙，這個就是所謂相對國家力量的由下而上，那透過自己真實的生命體驗，去在「沒有家園」的土地上建立「此時此刻」的家。讓一個陌生的「空間」轉變為富有情感與意義的「地方」，這是我們在講人文主義地理學的時候，空間跟地方有不同的意涵。空間在英文就是用 space，他是對人來說沒有意義的、空洞的，暫時的陌生的環境。place 則是有意義的，你投射了自己的經驗跟情感，進去熟悉、你可能會喜歡、適應的一個空間。

所以呢，比方說我們在一些作家的紀錄或回溯裡面，我們會看到說，他們剛來台灣的時候，曾寶蓀也是一個當年來的女性，他就形容他住在青田街，他形容那裡非常荒涼。聶華苓來到台灣居住環境，就是空蕩蕩的田野。那齊邦媛住在這個台大宿舍，他就描述森森暗影，非常可怕。當然這個對他們來說，他們剛來台灣，這可能只是逃亡路線的中繼站、是隨時準備離開、沒有情感意義的地方。可是一旦他們日復一日在這裡生活起居、定居下來，要進行尋常無奇的日常起居行動、操演日常生活節奏，這就是所謂說創造地方的一個行動，透過地方的創造，就開始建立起家。這個 Space 就會變成一個家的地方，有家的感受，因為你開始熟悉了。當然這個做為家地方的台灣，基本上統攝於中國國族地方，因為統治者也在把台灣打造成中國的地方，有中國色彩的地方。這些外省人來到這裡，我這個台灣家地方上面還有一個中國屋簷覆蓋，所以他可以安心留住於此。一方面我們會說，過去很多這種外省籍的行政官員，孫運璿啊、李國鼎，他們對台灣犧牲奉獻多少，努力建設台灣，把台灣建設成怎麼樣的地方。可是呢我們還是不要忘記，他們對台灣的貢獻，一方面是要打造美好的家地方，他們也希望這裡更適合人居的，更好的環境，但他同時也含有鞏固、捍衛「中國國族地方」的意義。會不會很難理解？不會吧？就是他一方面透過他的犧牲奉獻努力把這個地方打造更好了，一方面他有這種把這裡建造成家地方的用意，但同時他也是希望透過這樣的建造努力奉獻，可以更好地讓中國國族地方住在這裡，不會隨便垮掉倒掉。

那，這個是透過這個生活，所以他們漸漸熟悉了這裡。但是受到受到懷鄉情感以及對家鄉忠誠度的影響，還是會覺得失去自身的語言與文化是一個很重大的損失，所以這些群體會透過真實或符號的方式與故鄉保持聯繫。這是什麼？就是中國文字跟語言，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所以我們從前面的高文化又回來這裡了。就是說，高文化一方面是統治者想要控制，讓全部的國民、被統治者均質化的武器或一個手段。可是相反的，對於這些原本就屬於這個族群的人來說，這個東西是他們最後的堡壘，怎麼樣去認證或固守自己中國人的身份，我覺得就是中國的文字跟語言。這是為什麼大家看到國文教科書要改變的時候，國語文教育一但有任何變化，本土的東西要進去，為什麼跳出來的是這些外省籍的文學大家。就是對他們來說，這個東西是不可撼動的。你其他政治、經濟，讓你統治沒關係，可是這個東西反而是絕對不能失去的。聶華苓一輩子住在美國，他領香港一個文學獎的時候，他就說：「我的母語就是我的根，是我可以抓得住的根。」所以他必須靠這個，他才不會變成是美國人，他住那麼久，他還是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就是靠這個，所以他都用母語寫作。他只要掌握中文這項利器，最後終能「浪子歸宗」，所以他得獎的感言就是「浪子歸宗」這個成語，堅守中國人這個身分堡壘。這個就是你看，高文化，一個非常有趣的東西，他可以變成一個武器、手段，但他對另外一些人來說，是安身立命最後的憑藉。所以本土化運，這個建構台灣國族地方的工程，雖然動搖了外省人的中國國族地方感，也使其對於台灣，本土化運動為什麼外省

人會充滿懷疑或不確定，他們甚至覺得自己是不是要被趕回去，就是這個上面大的情感被牽起來了，所以他覺得惶恐不安，然後這個……我覺得今天好像沒時間看。

這個之後發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1987 年 11 月 2 日開放大陸探親，這個對外省人來說，當然對台灣也是，因為後來就發生很多、各種相關的社會事件。開放探親這個東西，就是讓這些外省一代，他們要開始思考的問題就是到底要落葉歸根，還是落地生根。確實很多人就選擇回去定居，或者死後希望骨灰葬在那裡。當然也有像齊邦媛老師他們一家都埋在台灣，他覺得對他來說就是落地生根。所以探親這件事，讓回家的阻礙消除，讓他們家人重溫天倫之夢，然後認同與歸屬獲得重新定位與安置。可是呢，他們同時也會發現自己的差異，過去他們覺得自己是中國人、想跟家人在一起。但是，經過不同的時間跟空間的這個隔離，經驗的累積，還能一樣嗎？其實他們會意識到一些深刻重要的差異，這就是所謂的外省台灣人，他們既不同本省的台灣人，也不等同於對岸的中國人，所以他們有點尷尬，在感受上真的非常尷尬。我們與對岸的家人已經如此不同，我們到底是誰？

而這個羅蘭，他其實回去了很多次，因為他家裡還有弟弟妹妹，因為他父親已經過世，他有一次就寫到這個：天津，天津！是我的家，又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哪裡，但早已人去樓空；他們有很多住的地方，在他父親工作的新村宿舍，我們搬離了那裡。後來父親也已去世了，我盼了四十年，回來了，卻發現我沒有家了！這個是很多外省人面臨的處境，就是雙重的失落。一方面他們在記憶中的故鄉、想像中的祖國，因著長久的隔閡與疏離，已經無法融入，他們真的是其中的「局外人」，變成台胞。可是他們在現實中的台灣家園，因為現代的台灣社會，我們需要強調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差異與對立，作為本土意識的核心，才能跟中國強調我們跟你不同，我們就是台灣，台灣就是台灣。可是這樣的意識或主張，會讓外省人，特別是第一代，他們會發現自己必須被無形的壓力，去重新檢視自己的生命歷程。那我這樣是政治不正確？我好像不符合他們所要的臺灣人的要件，不符合當今主流的意識形態，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外人，就是外省人。

所以他們最後是需要面臨這樣的思考，那最後這邊，像齊邦媛老師在《巨流河》裡面不斷強調從他父母親到先生，他們的會葬在這裡，可是還是有像這樣子的，某一種惆悵，或者是某一種無法融入的感覺：結婚、生子、成家立業，五十年在台灣，仍是個「外省」人，像那艘永遠回不了家的船，在海浪間望著回不去的土地。我覺得這大概就是某種很難解的問題，大概只能做到同情跟理解。他最後，在一篇訪談裡他也講到：「用鄉愁或惆悵來形容我們一生鋪天蓋地的鄉思，實在是太溫和了。」可是對於這種，他也沒辦法說出來現在要回歸中國，他覺得自己就是台灣人，但又是那麼不一樣的台灣人。誼？還有一點時間。那今天都沒有談到外省第二代，特別是在九零年代以後，文學、電影、戲劇、舞台劇，有很多都是外省第二代創作出來的東西，那這個東西也強化或形塑或者顛覆我們對外省人的印象，這就是第二代說的。可是我們也會發現，每個人說的、著眼點，或形塑出來的很不一樣。比方說在楊德昌的電影《牯嶺街少年》、朱天心的、再看阿女烏的，寫了眷村成長的這一代的年輕人，他們面臨的心靈的狀態或呈現的世界是那麼不一樣。

我要說的有些反面教材，接下來我們要看（1:49:07-1:50:38 的影片）。

好，這是負面教材，（1:50:42-1:54:45 的影片）。

好，那我們今天就要，就是說外省二代，特別從眷村文學，一系列以眷村為舞台的創作。他們面臨的是眷村要被拆掉，所以他們都會用非常懷念、溫情的眼光去書寫他們記憶中的眷村，譬如說王偉忠的《寶島一村》。確實每個人看了都會很感動，都會笑中帶淚，大概都會哭，有所感。可是不能只是留在這個部分，希望有更多的，就是你去看社會結構、當時的整

個社會體制，政治統治氛圍等等，這樣可能可以讓外省人的面貌更正確、多元的認識。那我今天就演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主辦單位：好，謝謝趙慶華老師。我覺得這個議題就這樣，打開一點點之後你就會想知道更多，不知大家今天聽了之後的感想如何，不知是否有人願意提問或回饋一下今天的演講。

台文所同學：就是剛剛看到簡報上有一個詞他寫「外省四代」，第四代，恩，可是我在想說，由我自己出發的話，我這個年紀，我的國族認同是大過族裔認同的概念，我就會想說有外省四代嗎，真的有的話，他們會用外省四代來自稱自己，還是用台灣人來稱呼自己，會有這個詞嗎？這個詞要怎麼理解他？

趙：這個詞我覺得會越來越少，就像我現在遇到的大學生，基本上已經對族群沒什麼概念，即使是客家都很淡薄，就大學生來說。特別我覺得外省人也是，因為人數本來就少，我遇到的，就像這位同學講的，不太會想自己是什麼族群這件事。現在台灣確實包括統獨、藍綠、中國台灣的意識，我們前面在講這些族群爭議，很高峰、很熱點的，這個時間確實已經過去了。我覺得也跟外省第一代，他們已經凋零很多，也有關。台灣意識、台灣國族這個東西，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還是往這個趨向去認同的。即使大家在講藍蛆、藍甲的時候，也比較不會講到族群身份，現在比較不會這樣說了，不像我們前面說的九零年代，或 2014 年那個前後，那個爭吵還比較大。現在相較來說，比較沒有那麼被提到。

謝仕淵：我覺得其實在當代的這個，以眷村為文化資產的文化基底，其實是一個很顯著而且是有大批資源的行動，也包括桃園、左營等等。但其實那個眷村，我們說的，所謂博物館，其實又是在台灣這個博物館事業當中，是發展得很慢的。那慶華老師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我有討論過永康那樣的眷村，我都覺得誰能做出楊德昌電影的那種感覺，他就是一個眷村博物館。但是這個我也覺得很需要討論。他其實面對的是一個，很決絕粗暴的拆除行動，那個跟這整個你生命的一部分要被快速剝奪了，在那個過程中你選擇當下的選擇性的記憶到底是什麼？他會不會是最後每個都一樣，就是每個眷村外都處理得很相似，都被時間凍結在同一個時間點，媽媽也不見了，或媽媽變成一個含糊不清的外省太太，然後外省太太也缺乏多元性。我覺得同樣的題材如果放在其他博物館，大概會被說，就是放在眷村博物館大家都覺得蠻好的這樣。這個是顯著的投資，因為依照我了解，有些縣市文化局的資源，一年有相當多比例在這方面投注資源，我其實很好奇這個事情你怎麼看待。

趙：我之前總覺得，你把眷村拆了，然後去用一個博物館是一件非常荒謬的事。就是你讓活著的人離開那裡，然後你去蓋一個史料的東西靜立在那邊，我自己是覺得這樣的東西很不OK。大概 2000 幾年初，我是看到現在的狀況，我也看到水交社也弄起來了，但是你確實就是走到各個地方的眷村博物館，大家都差不多，要強調的情調氛圍也差不多。就會覺得有需要這麼多嗎？或者是說，你不讓人好好住在那，把它拆掉，然後來弄一個。另外就是眷村之所以是眷村是因為有活的人住在那裡，營造出社群的氛圍，或者他們的文化、生活。現在他雖然已經不在，我其實覺得他是一個勢必要消除的東西。那，我不太知道，老師說的那個桃園的博物館營運。

謝：譬如說台中也是，比如說彩虹眷村，是裡面最慘的就是了。我覺得就這個部分，我意識到他並沒有一個文學博物館、歷史博物館等等，有共同在對話，討論一個這一類型博物館典藏的意義要怎麼處理。因為我有一次去退伍會開會，我說欸我覺得眷村博物館一定要談白色恐怖，大家就輪流看我，然後說誒那我們要談什麼這樣。但其實又是一個很重要，因為我在

左營知道其實是海軍，那個四五零年代，白色恐怖對於眷村內部生活產生很大的衝擊，大家都覺得話不可多說。那個事情其實是一個很決絕強大的力量，他可能決定眷村某一個時代的模樣，那這件事情一直沒有被好好討論。所以我一直覺得博物館是一體，是我們要去回應這個客人的，他不好是這樣子各縣市用一用，然後就（苦笑）。

趙：真的。你就會發現眷村住民自己真的也都只想談這些懷舊溫情的東西。就是《寶島一村》演了十年還在演，還去美國、新加坡、上海，不斷巡迴演了十年。我應該是他們剛上演的時候有去看過啦，然後我就發現去年，2018 到 19 年，他們還在演，這冷飯也炒得太久了，可是還是有人買單，大家都還是喜歡這種溫情主義的東西。

主辦單位：還有嗎？

趙：你一臉困惑你是有什麼問題？你來你來。

觀眾 A：這麼明顯？因為那個問題在我心中還沒形成，所以在自己困惑（聲音模糊。聽不太清楚）……我不知道，這是一個應該要推廣，讓大家知道的記錄在土地的歷史……（聲音模糊）就是讓大家隨著時間慢慢流掉，到底為什麼要這樣，覺得遺憾。……可惜。

觀眾 B：首先覺得很有趣的是，前面提到說我們這個世代的人……所以來這邊聽這個演講比較可以讓我們知道，這世代差異很大，可能不理解，在後威權時代，台灣會有很多意見分歧的時候，我覺得透過今天這麼完整的描述去解構外省人，是怎麼樣去形塑這個社會，讓我們去對台灣社會為什麼長這個樣子，政治社會動態的瞭解。我自己因為認識一些香港人，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會讓我想到香港，因為香港是英國殖民國嘛，可能這個中國大陸內部的人會怎麼說他們。像我們本省人被日本人統治過的，就會有文化上的不同，可能內地人就會罵他們是英國狗或什麼的。共產黨放很多人介入香港，生活條件越來越差，像是鳥籠，還有棺材堡。我有一個朋友他，因為我這個朋友也跟我差不多快三十，他媽媽是武漢人，他不敢跟他其他香港朋友提到這件事情。香港也有所謂雙非，就是說爸爸媽媽都不是香港人，我就覺得說鑑往知來。然後香港的廣東話也開始被壓抑，普通話也變成他們一定要學的東西，這個時代的香港人，他們普通話是講得好的。我就會想到說，台語有很大的斷層，可能我爸爸台語講得很好，但四十幾歲他的表妹他們不會講台語，那所以鑑往知來，不知道以後香港是不是他們自己也會面對很多不同的這種衝擊。

主辦單位：還有嗎？感覺每個人都可以說一點？你好像也有話想說。

觀眾 C：其實老師剛剛有提到水交社，這個問題十年前就被討論過。被討論的時候是因為，他們都要去做成立這件事情，剛好有個研討會在講台南市的文化資產，就有人說他非常反對成立這件事，你們把人都移走了，只留下那個建築物在那裡，到底有什麼意義？現場也是有眷村的人在那裡，他們就說，難道我們還要生活在那個空間嘛？那個空間已經無法使用了。所以會有兩個在拉鋸的東西。其實跟台灣現在的文資都一樣，可能做了之後都要去做維護，我覺得大家十年來都還在想說這件事情，但好像也有進步這樣。

觀眾 D：就是因為我的朋友或老師們幾乎都是同溫層裡面，後來研究所的時候，因為那個老師他是外省二代，剛才在講一些論述我都有上課聽到，比如說他們很窮，但當然還是有高級軍官不一樣。還有比如說講到民族主義是不好的東西這樣，然後在上課時也會覺得也是有道理，但沒想過，對，他們是不同的人，然後民族主義不好，再激化一下分裂啊。因為我這個聽完之後我又覺得，如果我們在談主體性，我們在講我認同什麼這也是不好的嗎？分裂，好

像不是這麼可以直接切割的事情，或直接蓋棺定論說這樣就不對。我是比較想知道後來這個事情，就是主體性跟民族主義的這種東西。

趙：就是自己講自己高興的。

主辦單位：好因為我們時間也差不多，不過我們最後一位朋友碰到的問題，也是我們大家會碰到的問題，我們也是在做一個所謂建構跟解構，或再建構再解構，可能是不斷地這樣子的過程。其實我們現在就台灣人可能辦演討會辦演講，我們其實心裡頭也是把台灣人框起來，覺得這內容是需要被討論，也歡迎大家繼續 follow 我們的講座。就像今天這位聽眾還在醞釀當中、思考當中，很歡迎私訊給我們，或在粉絲專頁留言，我們可以幫你轉寄給講師。我覺得持續討論，也不要害怕說不可以把這些東西拿出來講，其實我們都需要一個大家共同討論的機會。今天很謝謝大家來，也歡迎大家持續關注我們的講座，謝謝趙慶華老師，謝謝大家。

（朱英韶整理）

